

彭述之選集

第一卷

彭述之選集

第一卷

彭述之選集

第一卷

一九八三年六月第一次版

出版：十月出版社

九龍大南街321-323號4樓A座

3・862780

印刷：藍馬柯式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屈臣道2-8號屈臣氏大廈B座408室

定價：平裝港幣二十五元



著者攝於一九六五年

彭述之選集

第一卷



著者攝於一九六五年



陳碧蘭攝於一九六三年

出版說明

這部選集的著者彭述之，從一九二〇年參加共產主義運動時起，到現在已經有六十多年了。在這期間內，中國發生了許多震動世界的大事變，首先是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革命。當時，本書著者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身份，成為革命的領導者之一。在以後的半個多世紀內，他一直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從事革命工作。在這麼悠長的歲月裡，他寫了大量的著作，評析過各個時期發生的重大事件，提出自己的見解和主張。這些著作既是歷史的記錄，也是歷史的見證。著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去剖析事變，因而又對馬克思主義作出闡釋和發揮。

選集第一卷是二十年代的作品，主要是評論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各種問題。為此，我們選輯入著者當時在公開刊物上發表過的許多文章，和他對中共中央領導的批評意見；並加入他在1974年為《托洛茨基論中國》一書寫的導言，和八十一位原中共黨員聯署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彭氏是這份文件的三位起草人之一），後者作為本卷的附錄。這些有關當時的革命問題的著作，對研究中國近代史都具有珍貴的價值。

此外，還收入了彭氏的伴侶陳碧蘭為他所寫的一篇紀念文章，作為本書的代序，此文敘述了彭氏的生平，希望會有助於讀者對他的了解。

各文一般都按照寫作的時間順序編排，祇有極少的例外，為的是方便讀者閱讀而略作調動。

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出版技術上的一些錯漏、缺點會是難免的，希望讀者加以原諒，並提供意見，以便將來改正。

目 錄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

出版者說明

回顧我和彭述之的歲月(代序).....陳 碧 蘭.....1-33

《彭述之選集》日文版導言(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34-39

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是怎樣形成的?.....40-49

(一九六四年四月).....

中國共產黨及中國第二次革命簡史.....50-113

——為托洛茨基《論中國》寫的導言.....

(一九七四年四月廿六日).....

(一) 中共初期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傾向.....51

(二) 中共被迫轉向孟雪維主義.....55

(三) 中共向左轉——轉向工人階級.....65

(四) 革命的興起——中共與共產國際的衝突.....68

(五) 在共產國際的「國共合作」政策下，中共陷進了死巷.....74

(六) 從蔣介石到汪精衛.....81

(七) 從極右的機會主義跳到極左的冒險主義.....91

(1)南昌暴動.....91

(2)兩湖秋收暴動.....92

(3)海陸豐的蘇維埃運動.....93

(4)廣州暴動.....94

(V) 托洛茨基對中國問題的貢獻	95
(1)在帝國主義壓迫下，各階級反對帝國主義革命的態度	95
(2)關於共產黨的獨立問題	96
(3)關於蘇維埃問題	98
(4)革命失敗後的策略問題	101
(5)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	104
(6)關於中日戰爭的政策問題	108
結束語	112
義和團運動與帝國主義 (一九二四年九月七日)	114—127
江浙戰爭之世界政局的背景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128—130
江浙戰爭與國民黨 (一九二四年九月廿四日)	131—135
辛亥革命的原因與結果 (一九二四年十月八日)	136—144
英國工人政府的命運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145—147
廣東商團事變之根本原因及其對中國國民革命	
所與之教訓 (一九二四年十月廿二日)	148—155
請看麥唐納爾之革命方法 (一九二四年十月廿三日)	156
評反革命的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 (一九二四年十月)	157—164
十月革命與列寧主義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165—166
帝國主義戰爭的「休戰紀念」到了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167—170
目前政局與工人階級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171—173
段祺瑞執政與不平等條約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174—176
誰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177—193
孫中山先生之態度問題 (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	194—196

二七年鬥爭之意義與教訓	197-201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	
上海總工會被封與上海工人今後的責任	
(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	202-204
我們的北伐觀	205-218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日)	
北伐的歷史根源	206
前此北伐失敗之原因	209
各方面對北伐之認識	212
北伐前途——決定北伐勝利的條件	215
列寧主義是否不適合於中國的所謂「國情」?	219-226
(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日)	
怎樣答覆英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	227-233
(一九二七年四月)	
目前革命右傾的危險	234-242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南北妥協問題	243-249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讀了蔣介石二月二十一日之講演以後	250-257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評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路線	258-287
——在支部幹事會和中央省委區委各代表參加的	
聯席會議上的發言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二日)
第一次發言:	263

第二次發言：	265
中東路問題	265
機會主義派問題	268
反對派問題	279
革命性質問題	284
第三次發言：	285
評中共第六次大會及其決議案	288-304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 批評「六大」之必要	288
(二) 從「五大」到「六大」	290
(三) 六次大會怎樣解決了問題？	295
(四) 六次大會與共產國際的領導	300

附 錄：

我們的政治意見書	陳獨秀等八十一人	305-335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 中國過去革命失敗的原因——國際機會主義的領導		305
(二) 黨的現狀與危機——機會主義、盲動主義與官僚主義		313
(三) 國際機會主義的根源與蘇聯危機		321
(四) 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兩條路線的鬥爭		329
(五) 我們的態度與建議		333

回顧我和彭述之的歲月（代序）*

陳碧蘭

這裏我不想在這篇短文中爲彭述之作傳記，而只是試圖將我從一九二五年認識他的時候起，迄至今日整整四十年中，他的思想，他在中國共產黨中的作用與活動，以及三十六年來他在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的作用和艱苦鬥爭的情形，作一個輪廓性的敘述。

我認識彭述之是在一九二五年秋，但我認識他的思想早在認識他本人之前。當一九二四年末，我還在莫斯科東方共產大學學習時，就從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嚮導》週刊和理論雜誌《新青年》上讀到他的文章。他的第一篇題爲《帝國主義和義和團運動》（發表於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出版的《嚮導》週刊上），有系統地分析和闡述了從鴉片戰爭以來，即從英帝國主義以大炮轟破了中國的萬里長城後（一八四〇—一四二年鴉片戰爭），中國如何逐漸成爲國際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詳細地引證了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軍事、經濟、政治和文化侵略的歷史事實。由此給義和團運動確定了一個觀念：「它是中國農民群眾受了帝國主義過分壓迫而起的一種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因而駁斥了近代史家所謂「拳匪之亂」和一般人稱之爲「野蠻排外」等污蔑的傳統

* 本文爲紀念彭述之七十歲生日而寫，初發表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日及十一月廿三日的《洲際通訊》。

觀念。這不但在中國共產黨內對義和團確定了一個正確的觀念，而且在社會上，尤其在文化界掀起了一個風浪，那些有名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教授們（如北京大學名教授胡適之等），都高聲叫喊：「這是推翻了中國歷史的傳統觀念，這是翻案了！」

其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一文（發表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雜誌上），自一九二三年初，共產國際認定中國革命是各階級的民族民主革命，因而指令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政策後，在黨內便發生了那一個階級是這個革命的領導者的問題。因為依照國際的指示，顯然暗示着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不能單獨擔負領導國民革命的使命，因而必須加入國民黨，同國民黨合作。當時共產黨的領導層，在接受了國際訓令之後，便改變了原有的無產階級立場，發生了一種極右的傾向。例如毛澤東在他的《北京政變與商人》一文中（發表於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出版的嚮導報上），他曾公然號召天津和北京的商人（即資產階級）「一齊起來和上海的商人採取一致的革命行動，商人的團結越廣，聲勢越大，領導全國國民的力量也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重點為我所加）這明顯地認為資產階級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隨後，陳獨秀寫了一篇題為《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的文章（發表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前鋒》月刊第二號）。在此文中，他從中國各階級的分析 and 力量的對比中，所得出的結論是：只有資產階級才能領導國民革命。因一方面，這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同時，工人階級的數量和知識還不夠領導這個革命。這種思想在黨內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混亂和迷惑。因而彭述之便針對着陳獨秀的文章，寫了《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他雖沒有提到陳獨秀

的名字，但實際上是批評他的觀點的。①

彭述之在這篇文章中，把中國各階級的經濟基礎和利益，從銀行、商業、工業資產階級，一直到工人、農民、手工業者，以及一般的小資產階級，按照它們的經濟基礎和利益加以詳細的分析，從分析中指出：中國的資產階級，包括工業資產階級，都是直接或間接依靠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因而絕不能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而領導國民革命。而且由於害怕站在他們背後的無產階級，不可避免地是反動的。因此，他得出的結論說：

「我們分析了以上各種階級……我們現在可以斷定，在物質的基礎上，在革命的覺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環境上，以及中國各階級的利益和意識的趨向上，中國的國民革命，只有中國的工人階級配作領導者，也只有它能作領導者。」

彭述之於一九二〇年秋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一年春到莫斯科東方共產大學學習，并被選為中國共產黨旅莫支部的書記，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回國時為止。據同志們說，他在旅莫支部作過很好的貢獻，曾經為他們作過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許多報告，同他們討論各種問題，因而同志們對他很尊重。當我在那裏時，繼任的書記為羅亦農（他於一九二五年春回國，不久即任上海區委書記，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死於蔣介石之手）。那時同志約近百人，有些是從法國和德國轉到那裏的，但多半是從中國派去的。我們除了正式上課外，晚上或星期日常舉行演講會或討論會。當我們討論了彭述之的《帝國主義和團運動》和《誰是國民革命之領導者》這兩篇長文之後，大家都一致推崇和同意他的意見。因此，在一九二五年初歡送李大釗②回國的晚會上，主席劉伯堅（後為馮玉祥政治部主任，亦

被蔣槍斃）的致詞中，他微微地帶着驕傲的神情說：「我們這裡已經回去了一枝筆，那就是彭述之同志，相信現在李大釗同志回去，對我們黨定有重大的貢獻」。「一枝筆」這幾個字在我的腦中刻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因我對這方面有興趣）。這也就是我在本文開始時所說的：我認識彭述之的思想早在認識他本人之前的真實情形。

彭述之自一九二四年夏回國後，除了在《嚮導》報和《新青年》上寫文章外，並參加上海地方的實際工作。當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四次大會，他被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常務委員會（即政治局）的委員，並主編黨機關報《嚮導》和理論雜誌《新青年》。當我於一九二五年秋到上海後，參加上海全體女同志會議時，經過中央婦女部的負責者向警予的簡單介紹，我才知道準備在這個會議上作政治報告的便是在莫斯科時曾經讀過他的許多文章的彭述之同志。他的態度沉靜而嚴肅，但對同志很熱誠，這便是我初次對他的印象。

① 據述之後來告訴我，當他這篇文章寫好之後，即將原稿交給陳獨秀看，希望和他取得一致的意見。結果，陳獨秀在新青年同一期上作了一篇題為《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的教訓》。在這文章中，表明他已放棄了以前的意見，而接受了無產階級領導國民革命的觀點。

② 李大釗為中共創始者之一，他因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而留在莫斯科研究。於一九二七年四月為北洋軍閥張作霖所絞殺。

在第二次革命時期

當時中常委爲五人即：陳獨秀、彭述之、瞿秋白、蔡和森和張國燾，但實際上經常只有三人，蔡去莫斯科，張經常不在上海，陳獨秀經常在中央辦事處和各地來的同志接頭（述之也常去），瞿秋白由於俄文較好，經常同國際代表接觸，同時他不喜歡參加上海區委（包括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在內）地方性的會議，也不喜歡和同志們接觸。因而參加上海區委會議的就只有彭述之。他不但代表中央常務委員出席上海區委的各種會議，而且還經常出席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中央常務委員會。

由於彭述之經常參加上海區委常務委員會的會議（我亦其中委員之一）以及其他的各種幹部會議，我和他接近的機會很多；同時，因文字工作的關係，我常到他的住所去，因他是中央宣傳部的主任，我所主編的《中國婦女》（黨中央辦的）有些重要的文章，政治的或理論的，我都要拿去給他看或者經過他修改。這樣，我和他接近的機會也就更多，經過一個相當的時期，雙方相互了解，我們便決定生活在一起。

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初，由於五卅運動所掀起的普遍全國的反帝國主義和軍閥運動，廣大的群眾、工人、農民、學生、婦女以及一般的小資產階級的分子，都捲入於革命的浪潮中。因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運動，以驚人的速度在全國的範圍內蓬勃地生長着。單以上海來說，在每一次事件發生後，如反奉戰爭，反對日本出兵滿洲和北京「三一八」慘案等，都會舉行十萬人以上的龐大的市民大會與遊行示威，以及街頭演講，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侵略與壓迫。恰在憤怒與激昂的情緒之下舉行了規模宏大的對北京「三一八」慘案的市民大會與遊行示威之後，一九二六